

# “利益相容”与新型国际关系建构

——英美、英德关系(1898-1945年)的历史镜鉴\*

赵 斌

**内容提要:**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的核心在于合作共赢。既有研究尤其是国外学界对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的解读尚有不足之处,甚或催生错误认知。本文以“利益相容”为理论视角,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英美和英德关系的经典历史案例比较后发现,即使在战争频仍的帝国主义时代,仍存在“利益相容”的可能。美国拓展“相容利益”实现英美权力和平转移,德国偏向“狭隘利益”与国际社会福祉相疏离的历史,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新型国际关系建构,应寻找“利益相容”,国家间政治互动更应以史为鉴,尽可能实现合作共赢。

**关键词:**新型国际关系 利益相容 英美 权力转移 英德关系

## 一 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外交的新理念,其深刻内涵涵盖了国际关系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其中,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的提出,对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作出了具有前瞻意义的全面解读,即认清时代潮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按照亲、诚、惠、容理念推进周边外交,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就词源及理论命题意义而言,新型国际关系之所以为“新”,一方面是与“旧式”国际关系相比较而言;另一方面,新型国际关系也带有些许未来政治远景色彩,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希冀实现与世界的良性互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兴大国气候政治合作与中国气候外交研究”(批准号:15CGJ009)的阶段性成果。在构思行文过程中先后得到武汉大学罗志刚教授和阮建平教授的指导,英国爱丁堡大学克里斯汀·霍普韦尔(Kristen Hopewell)博士、西安交通大学金新博士和刘占虎博士为本文写作提供了建议与帮助,《欧洲研究》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极富启发性的修改意见,作者在此一并感谢,文中谬误概由作者承担。

动,反映了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双重要求。那么,探寻新型国际关系的建构路径,显然离不开必要的历史学习和理论反思。

国内学界对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的理解和思考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本身的深刻内涵进行深度挖掘和再认识,认为该理念是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对未来世界秩序演进方向的重要判断;认为“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从政治哲学的高度展示了中国崛起的和平属性,为世界未来发展描绘了新的愿景;或从中国文化理念进行解读,认为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是对“和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还有从时空维度对新型国际关系进行再认识,即新型国际关系旨在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是人类社会实践时间发展的必然,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空间关系调整的必然。<sup>①</sup>

另一类则是有关新型国际关系建构的可能性探讨,认为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本身与国际组织、联合国、新兴大国崛起等现实相契合,从而有望重塑国际关系实践;或认为新型国际关系属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一部分,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在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过程中,应继承邓小平有关“不当头”的思想,走和平发展道路,把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当作最大的机遇,结伴而不结盟,在不干涉内政、尊重国家主权与平等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国际责任;或者强调中国外交的主体性,大力弘扬共存、共享、共治、共赢和共进的中国外交核心价值观,同时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外交核心价值观,增进外部世界对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的理解和支持,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特别是道义感召力,展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风范,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应强调中国的责任与担当,其关键是塑造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战略视野是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基本路径是制度化合作,重点是东亚和中国周边,丰富和完善中国地区战略。<sup>②</sup>

与国内学界对新型国际关系理念进行全面而深刻的解读所不同的是,国外学界与

<sup>①</sup> 阮宗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超越历史 赢得未来”,《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2期,第16-30页;田德文:“‘中国梦’与‘欧洲梦’:新时期中欧关系研究”,《欧洲研究》2016年第4期,第144页;金应忠:“从‘和文化’到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第18-33页;袁伟华:“时间与空间:新型国际关系中的时空观”,《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3期,第26-43页。

<sup>②</sup> 张贵洪:“联合国与新型国际关系”,《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5期,第103-111页;郭树勇、史明涛:“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体系的可能——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设立看世界秩序变革”,《国际观察》2015年第2期,第15-29页;杨煌:“超越‘国强必霸’的老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创新及其意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2期,第129-133页;李文、沈予加:“论邓小平外交思想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指导意义”,《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2期,第3-10页;王存刚:“论中国外交核心价值观”,《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第4-20页;门洪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的责任与担当”,《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3期,第4-25页。

之直接相关的研究并不多见,而且有可能受西方政治哲学尤其是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对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的原初话语即“新型大国关系”更感兴趣——尽管“新型大国关系”主要讨论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但其“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核心内涵为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所继承和发展。美国著名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The Jamestown Foundation)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新型大国关系”实则并非仅仅为中美关系而首创,而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俄关系发展经验的迁移运用,反映了中国外交政策致力于追求稳定的大国关系并试图构建一种“新的国际秩序”以塑造美国对外行为的外交努力,但考虑到在安全利益上中美两国仍存在重大的认知分歧,即使避免冲突成为共识,新型大国关系建构仍十分困难;鉴于全球权力流散化的事实,美国有必要对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作出回应(探讨构建这种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条件),并重申美国对演化中的国际秩序的立场,从而捍卫自由秩序,以适应国际体系的和平变迁。<sup>①</sup>无独有偶,美国的“中国通”大卫·兰普顿(David Lampton)强调,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其核心前提在于中美大规模冲突并非不可避免(因为冲突对中美两国以及整个世界而言都是灾难,且双方倘若在主要议题方面不合作的话,成本和代价极大),因而须在创造就业、协调外交与安全政策、增强危机管控能力、军事合作与战略对话、建立包含中美两国在内(而非排斥对方)的亚洲经济与安全制度等方面拓展和深化合作。<sup>②</sup>

然而,反对其声甚或妖魔化的解读仍然极具煽动性,并试图反馈或传递“中国威胁论”信号。例如,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美国《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和《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先后刊文,认为“新型大国关系”并无新意,不过是中国继20世纪50年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来的口号翻新,因而不论多么契合于将崛起大国纳入现存国际秩序的战略需求,美国都不应对这种“新型大国关系”给予政策回应;基于所谓“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的认识及其历史记忆,霸权/主导国家的言行在很大程度上能塑造和影响崛起大国,因此,“新型大国关系”是一种具有深层缺陷的危险标语,美国应当拒绝接受“新型大国关系”,并试图提出有关21世纪大国关系发展路径的美国方案,以期塑造和影响中国,从而实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主动

<sup>①</sup> Paul Mancinelli, “Conceptualizing ‘New Type Great Power Relations’: The Sino-Russian Model”, *China Brief*, Vol.14, Issue 9, 2014, pp.12-16, [https://jamestown.org/wp-content/uploads/2014/05/China\\_Brief\\_Vol\\_14\\_Issue\\_9\\_04.pdf](https://jamestown.org/wp-content/uploads/2014/05/China_Brief_Vol_14_Issue_9_04.pdf), last accessed on 23 March 2017.

<sup>②</sup> David Lampton, “A New Type of Major-Power Relationship: Seeking a Durable Foundation for U.S.-China Ties”, *Asia Policy*, Vol.16, No.1, 2013, pp.51-68; 与之相近的观点可参见 Abraham Denmark, “Forging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in the Global Commons”, *American Foreign Interests: The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Vol.35, No.3, 2013, pp.129-136.

领导(proactive leadership)。<sup>①</sup>从自身固有的理念出发,外部世界倾向于聚焦中国崛起对国际秩序的意义,却时常有意无意地忽略中国崛起的内部张力,即崛起进程何以改变中国对崛起本身的想法、中国的全球新地位与权力、全球秩序的特征等;同时世界秩序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亦非单纯由中国来塑造,尤其当权力运行涉及区域国际关系时,原本试图说服他者接受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这一努力更是难上加难。<sup>②</sup>

由此可见,有关“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的研究现状,基本反映了国内外学界在此问题上缺少对话的尴尬现象——这种情形既可能是国外学界和政界(有意无意)回避/拒斥“新型国际关系”(尤其是“新型大国关系”)所致,并形成显著的“非对称”局面(对中国外交新理念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或助长错误认知),又反映了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方面的明显差异,同时也说明“中国威胁论”仍在一定程度上以不同的形式长期存在。尽管短期内让外部世界充分理解乃至接纳中国外交新理念或许存在一定的难度,但回归学术分析和学理讨论本身仍十分必要,如对新型国际关系的具体建构路径,国内外相关研究注重理论探讨,缺乏更为坚实的案例分析。笔者认为,即便我们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所偏好的甚至存在“美欧中心主义”迷思的经典案例出发,仍可以获得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的若干重要历史启迪。因此,下文将主要通过英美权力转移和英德关系冲突的历史比较,寻找“利益相容”,从而为探讨新型国际关系建构路径提供历史、理论和现实启迪。

## 二 核心概念与理论假定

在进入案例讨论之前,有必要对本文涉及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并简要说明相关的理论假定。

“利益相容”(encompassing interests)一词来自经济学和社会学。早在1965年,美国经济学和社会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其制度经济学三部曲的开篇之作《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产品与群体理论》中就开宗明义地提到,即使理性的个体都能在集体行动目标达成后获益,也并不意味着这些个体会因此而采取行动,除非该

---

<sup>①</sup> Peter Mattis, “Nothing New About China’s New Concept”,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ne 7, 2013,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nothing-new-about-chinas-new-concept-8559?page=show>; Andrew Erickson and Adam Liff, “Not-So-Empty Talk: The Danger of China’s ‘New Type of Great-Power Relations’ Slogan”,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9, 2014,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4-10-09/not-so-empty-talk>, last accessed on 23 March 2017.

<sup>②</sup> Jinghan Zeng and Shaun Breslin, “China’s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A G2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2, No.4, 2016, pp.773-794.

集体当中的个体数目极少,或者存在强制与其他特殊举措来敦促他们为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s)而采取行动——简言之,理性的、利己的个体将不会为达成所谓共同或集体利益而努力。<sup>①</sup>于是,一个群体(group)<sup>②</sup>的行为是排外(exclusively)还是相容(inclusively),取决于该群体所追求目标的本质,而非群体成员的任何特质;由于排外群体希望精减其成员个数以确保集体行动的生成和获益,因而个体成员间关系往往较为紧张——唯恐被淘汰出局;在相容群体中的情况则相反,一方面,该群体并不想淘汰其中任何成员,另一方面,有关集体行动本身其实也不需要全体成员参加。因此,相容群体中的个体成员以拒绝参加集体行动来讨价还价的投机策略的效果将大打折扣。<sup>③</sup>借用博弈论来解释,相容利益产生于正和博弈,而排他利益则是零和博弈。<sup>④</sup>鉴于此,奥尔森通过《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一书进一步给出“相容利益”的定义,即某个组织/利益群体有动力推进社会繁荣,并尽可能以最小成本对其成员进行利益再分配。可见,相容利益群体本身的福祉与其所处社会的繁荣存在紧密关联,因而即便是出于最终获益考虑,该群体也情愿付诸集体行动以推进社会福祉。<sup>⑤</sup>

显然,“相容利益”带有深刻的经济学烙印,当将其迁移运用至政治学时,可以此说明为什么一个独裁者会为该国提供公共产品,因为他在其中具有“相容利益”:官员、政党、利益集团、君主或任何其他部分的抑或整体的社会“所有者”(owner),其社会当中所占有的“相容利益”份额越大,则为社会采取行动提供公共产品的动力也越足。有关“相容利益”的理论逻辑结构在于这种利益和“狭隘利益”(narrow interests)是相对立的,“相容利益”关心社会的产出而“狭隘利益”则不然(甚至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社会福祉),小群体能参与自愿的集体行动而大群体则未必情愿。<sup>⑥</sup>于是,在

<sup>①</sup>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2.

<sup>②</sup> “group”又译作“集团”、“团体”、“集体”,但根据社会心理学、政治学(国际政治)尤其是联盟理论的语言和现实来理解,集团似更接近于某种联盟/结盟状态,笔者认为将“group”译作“群体”为妥,群体成员之群我身份因之带有不确定性;既可能是一种潜在的、形成中的准集体身份甚至联盟/结盟,又可能仅仅只是乌合之众。对群体与群体化的相关研究,参见[美]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张好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赵斌:“全球气候政治中的美欧分歧及其动因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85页;赵斌:“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形成机制——集体身份理论视角”,《当代亚太》2013年第5期,第112页;赵斌:“全球气候治理的‘第三条路’?——以新兴大国群体为考察对象”,《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4期,第76页;赵斌:“群体化: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路径选择”,《国际论坛》2017年第2期,第9页。

<sup>③</sup>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pp.39-43.

<sup>④</sup> 史云贵:“相容利益狭隘化:破解国家荣衰兴亡周期律的一种新解释”,《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第15页。

<sup>⑤</sup> 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54-57.

<sup>⑥</sup> See Mancur Olson, “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7, No.3, 1993, pp.567-576.

《权力与繁荣》有关权力的逻辑讨论中,奥尔森再度明确了“相容利益”作为权力行为体所获收益与社会福利之间的相关性,且二者成正相关关系,即行为体在社会总收益增量中所占份额越大,则可能相应承担更多的损失风险,那么该行为体在其所处的社会当中就具有相容利益,因而行为体越有动力关注自身行为对社会福祉的影响。<sup>①</sup> 据此,本文将从方法论意义上借鉴“encompassing interests”这个理论概念,但根据国际政治的历史与现实,尝试将其“倒装”译作或理解为“利益相容”:两个(及以上)国际政治行为体(尤其是主权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sup>②</sup>中的个体利益虽说千差万别,但同样存在群体利益“相容”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与奥尔森讨论的国内经济社会状况不同的是,国际社会中的某个行为体在和他者初次相遇<sup>③</sup>之前并非是一张白纸,而出于各自复杂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往往具有某种给定/先验的利益认知。那么,寻找“利益相容”表现为多个行为体希冀彼此利益互动“相容”(inclusively),从而建构起相容群体,共同服务于国际社会福祉,以期最终实现合作共赢。可见,寻找“利益相容”是建构相容群体身份的起点和必由路径,其最终归宿则是该群体成员所置身的国际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群体内成员愿意为这一公共目标而采取集体行动,相互协调乃至共同合作。需要指出的是,国际社会福利/公共利益往往具有时代性,可以是秩序、安全、国际市场价值目标等;“利益相容”可能是合作共赢理想的序曲或前章,是一个关键的先决变量(predetermined variable),但不等于合作因此自动生成或权力和平转移的自我实现。

此外,为分析和论证的需要,本文还将借鉴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理论视角,根据

<sup>①</sup> See Mancur Olson, *Power and Prosperity: 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p.13.

<sup>②</sup> 为与奥尔森提出的“相容利益”所置身的社会(society)保持一致,本文使用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一词,而没有用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的概念。现有相关研究认为,尽管和国内社会情形存在差异,奥尔森“相容利益”理论对于理解国际社会中的国家间合作仍具有重要启迪,例如寻找联盟维系的经济动因、分析国际组织平台基础上的国际合作动因、基于集体行动理论考察国家联盟(如北约)的行为并思考责任分摊等,参见 Mancur Olson and Richard Zeckhauser, “An Economic Theory of Allianc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48, No.3, 1966, pp.266-279; Mancur Olson, “Increasing the Incentive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25, No.4, 1971, pp.866-874; John Oneal,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Burden Sharing in NA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4, No.3, 1990, pp.379-402; Paul Tayl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Pinter, 1993, p.43.

<sup>③</sup> 对“初次相遇”与行为体社会性的相关讨论,参见 Tzvetan Todorov, *The Conquest of America: The Question of the Other*,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4;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328-330; Naem Inayatullah and David Blaney, “Knowing Encounters: Beyond Parochi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Yosef Lapid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 eds.,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to IR Theory*,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6, pp.65-84; Sujata Chakrabarti Pasic, “Cultur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all for Extension”, in Yosef Lapid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 eds.,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to IR Theory*, pp.85-104; 但兴悟:“从马嘎尔尼使华看国际体系之争”,《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2期,第1-27页。

1898-1945年国际关系史的基本脉络,初步假定英国为现实-自由主义国家、美国为自由-现实主义国家、德国为进攻型现实主义国家。这一理论假定的基本历史前提在于,1898-1945年的大英帝国虽已步入衰落进程,但至少在名义上仍是全球体系/国际社会中的霸主。

综上,本文的基本假设是:英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形成,经由现实主义的扩张,再到自由主义式的守成,美国则由于独立战争及政治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地缘优势,其对外关系似乎走的是一条(与英国模式)恰好倒置的“自由-现实主义”路径。处于守成阶段的自由主义英国与专注(美洲)地区事务且同样偏好“自由主义”的美国似乎较容易形成“利益相容”局面,从而共同维系国际社会福利。相反,德国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始终走的是极端现实主义路线,因而容易引发国际战争和体系冲突。

基于核心概念和基本假定,下文将分别讨论英美权力转移和英德关系的历史案例,并从中总结若干经验。

### 三 英美权力转移的历史遗产

1898年美西战争及其最后的结局,标志着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强国开始崛起。几乎与此同时,欧洲大陆上德国的强势兴起,使英国的殖民霸权及其主导的国际社会秩序遭遇来自美国和德国的双重挑战。寻找“利益相容”这一诉求对于英国而言,或许有些不得已而为之,但却是“两害相权取其轻”、“非对称相互依存(逆转)”以及“不列颠治世”衰朽等战略抉择、情势所迫和国际社会变迁综合使然。

#### (一)“两害相权取其轻”之战略抉择

回顾世界史可知,一国的经济规模或生产力水平对国际地位的提升至关重要,美国在一战前即已跃升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英美权力转移现象初现端倪,并早于后来的英德竞争。<sup>①</sup> 19世纪末的大英帝国,其全球权力实际上遭遇至少三方面的挑战:美国在西半球的强势崛起,德国将日益增长的经济与工业实力投放到世界级战舰的建设,以及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实力的上升。相对这些帝国主义后起之秀,英国国内增长已然放缓,维系全球利益价值链和庞大的殖民地经营自然力不从心,再加上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1902年)的爆发,英国损失较大、虽胜犹败,“日不落帝国”引以为傲的殖民体系亦开始松动。因此,不论是客观形势还是主观条件,名义上仍为世界

<sup>①</sup> Steve Chan, *China, the U.S., and the Power-Transition Theory: A Critique*,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 3.

霸主的英国不得不“审时度势”，调整对策。

之所以说“两害相权”，不仅是出于现实主义政治哲学和冷峻的国家利益观的考量，而且在于美国这一看似同英国存在“亲缘”关系的影响，从一开始留下的亦非愉快的历史记忆——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英国自然希望美国维持一种虚弱、分裂的国家状态，而非成长为英国霸权的挑战者。然而事与愿违，在经历这两场具有世界意义的战争后，美国开始在西半球挑战英国业已建立的大西洋海上优势以及在南北美地区的帝国主义特权。1895年，委内瑞拉危机爆发，美国坚持其在1823年发布的“门罗宣言”原则，使英美双方一度剑拔弩张，但几乎与此同时，第一次布尔战争后独立的德兰士瓦政府与英国关系交恶并爆发冲突，德皇威廉二世明确表示支持前者。此举无疑激怒了英国并使国际局势雪上加霜，美国则趁机利用外交斡旋等手段，加强和英国的对话协商以解决委内瑞拉危机，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英国的利益诉求。

面对“艰难形势”，英国权衡之下做出抉择，它认为，“大不列颠目前尚未拥有足够的海军力量对美作战”，况且“不列颠培养同美国之间的友谊，也是为夯实大英帝国优势的扩张政策的一部分，审慎的撤退是战略地位紧急使然”。<sup>①</sup>可见，同时面对来自美德的挑战，英国偏向于向美国寻找“利益相容”。于是，自1896年起，英国对美国的外交旨在运用战略克制以期弱化同美国之间的地缘竞争。此后连续几年内，双方也确实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高度默契”，即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相互协调、达成共识并签署协议，如在白令海峡捕鱼权问题、巴拿马运河问题、美阿拉斯加和加拿大间边界问题上等，不一而足。英美之间的“利益相容”首先开启于高级政治领域，而且这种“相容”给当时（大英帝国仍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社会带来的福祉，离不开极少数杰出外交家（如英国的索尔兹伯里侯爵）或政府首脑（如美国克利夫兰总统）的斡旋，从而使英美两国从冲突螺旋的窘境中平稳退出。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后，英美之间的“利益相容”局面得到进一步发展，双方的贸易和金融既得利益者成了改善关系的重要推动力量，英国也在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国表示支持。此外，媒体和大众政治参与也在英美寻求“利益相容”的进程中推波助澜。以美西战争为例，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态度不同，英国的公众舆论、国内主要报纸杂志几乎压倒性地支持美国在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的行动，大量政治社团向英国政府公开表示支持英美友好，媒体和公众的这些立场也为

<sup>①</sup> Kenneth Bourne, *Britai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North America: 1815-190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340; Stephen Rock, *Why Peace Breaks Out: Great Power Rapproche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9, p.36; Charles Kupchan, “Grand Strategy and Power Transitions: What We Can Learn from Great Britain”, *New America Foundation*, July 2011, p.3, <http://202.120.43.103/Downloads/20150318200039758.pdf>, last accessed on 23 March 2017.



政府所接受。<sup>①</sup>“两害相权取其轻”,缘何英国向美国寻求“利益的相容”,而德国却成了英国霸权的敌对者?就英国的战略抉择而言,固然存在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但这不仅是英美双方互动的后果,而且取决于其他要素(比如德国、西班牙乃至殖民地国家等“共同他者”)所构筑起来的国际社会复杂系统效应。这一系列复杂要素之间的动态耦合,使英国处于一种新的变化中的“相互依存”态势。

## (二)“非对称相互依存(逆转)”之情势所迫

英美关系研究存在一种惯性思维,不妨称之为“文化解释论”偏好,即认为英美在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存在亲缘关系,一般不会倾向于兵戎相见。例如,英国海军高级将领戴维·贝蒂(David Beatty)认为,为英语国家共同体利益考虑,要与美国建立同盟;这种“盎格鲁-撒克逊”纽带似乎形成于19-20世纪之交,英国政治精英常宣称英美之间是“种族血缘关系”,与美国开战无异于某种“内战”甚或“兄弟相残”。<sup>②</sup>面对英国的“善意”,美国似乎也不忘“投桃报李”。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将不列颠称为美国“最好的朋友”及“在起源、语言、思维、文艺、制度、理念乃至双方所青睐的文明方式、文明程度等方面联系紧密的共同体”。20世纪初,美军总参谋部甚至断言与英国之间的战争将是“所有冲突中可能性最小的”。著名战略家马汉也曾在《海权论》中指出,英美两国基于共同血缘的亲近感,可能在控制海洋方面建立合作,确立同一种族对海洋的支配,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传统使两国相互感知,具有共同血缘的两国人民之间的隔阂正在消除。<sup>③</sup>

然而,“文化解释论”更多的具有“事后诸葛亮”色彩,同时也有将外交辞令、大众政治语言等同于国家间政治背后的真实意图的可能,因为这种“文化”因素偏好其实无法解释英美双方起初切实存在的敌对,以及上文所提到的美国毕竟位列“两害”之一。事实上,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大英帝国凭借资本原始积累、海外贸易、殖民扩张、霸权战争等血与火的手段建立起来的自由秩序可贴上“现实-自由主义”标签。换言之,长期的征伐所构筑起来的(英式全球)自由主义秩序,以及随后形成的英美相互依存态势自然是非对称的,英国在这一非对称相互依存中占据绝对优势。然而,这种

<sup>①</sup> Robert Neale, *Great Britain and United States Expansion, 1898-1900*, East Lansing: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6, pp.134-135.

<sup>②</sup> Christopher Bell, *The Royal Navy, Seapower and Strategy between the Wa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50; Charles Kupchan, *How Enemies Become Friends: The Sources of Stable Pea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96-97.

<sup>③</sup> Charles Campbell, *From Revolution to Rapprochem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1783-1900*,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74, p.201; N.F. Dreisziger, “The Role of War Planning in Canadian-American Relations: 1867-1939”, *Canadi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 Vol.10, No.3, 1979, p.343; [美]马汉:《海权论》,萧伟中、梅然译,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367-368页。

态势从来都是动态演化而非一成不变的,一如英国本身从现实主义式征伐走向自由主义式守成帝国之兴衰史。反过来看,美国在西半球的大国崛起更像是“自由-现实主义”的路径。凭借大西洋、太平洋之辽阔海域的屏障,颇具贸易大国色彩的“自由主义”美国似乎更容易与英帝国分享“相容利益”,从而有别于德国在欧陆采取的进攻型现实主义崛起路径。何况,美国对国内市场的倚重相比德国依赖海外市场的经济成长模式而言,对英国的冲击相对较小。<sup>①</sup>就此而言,“两害相权”的观点,比单一的“文化解释论”更具说服力。而且,相互依存态势的逆转,亦即经济的、自由主义的权力互动虽仍是非对称的,但已开始往美国方面倾斜。

诚然,避免了单一的“文化解释论”,并不意味着必然滑向“经济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sup>②</sup>如果说“两害相权取其轻”反映的只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英国战略抉择的权宜之计,那么从英美海军军备竞赛的终结(1929-1930年)、巨额战争债务的负累(1929-1932年)、欧洲及远东安全形势应对之力不从心(1930-1932年),到不得不明确与美国“合作”(1932-1935年),再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热切希望美国支持英国(1935-1941年),乃至共建“新的世界秩序”(1941-1945年),英国的全球优势正是这样一步一步被消解并让渡给美国。<sup>③</sup>也就是说,与整个19世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恰好相反,非对称相互依存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发生了逆转,大英帝国在经济方面逐步失去绝对优势,同时失势的还有其长期引以为傲的海上军事力量,乃至英国主导的全球均势亦逐步失衡。例如,1922年2月6日,华盛顿会议签署的《五国条约》(《美、英、法、意、日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使英国皇家海军首次失去全球霸主地位,甚至公开宣称不再追逐海上霸权;而且《五国条约》或多或少还是英国有意为之,以求“与美国享有同等地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政治家也反复强调这一点。<sup>④</sup>一般而言,非对称的相互依存会产生权力,<sup>⑤</sup>而这种逆转的相互依存态势,恰恰

<sup>①</sup> 黄琪轩:“大国经济成长模式及其国际政治后果——海外贸易、国内市场与权力转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9期,第107-130页。

<sup>②</sup> “经济决定论”往往将经济因素视作衡量大国兴衰的核心指标,也常作为压倒性的论据用于分析国家间优势对比,相关代表作参见 Correlli Barnett, *The Audit of War: The Illusion and Reality of Britain as a Great Nation*, London: Macmillan, 1986;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p.274-343; Anne Orde, *The Eclipse of Great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ish Imperial Decline, 1895-1956*,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 pp.99-159。

<sup>③</sup> See Brian J. C. McKercher, *Transition of Power: Britain's Loss of Global Pre-eminence to the United States, 1930-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sup>④</sup>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London: Macmillan, 1983, p.325; [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211页。

<sup>⑤</sup>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89, p.11; David Baldwin, “Power Analysis and World Politics: New Trends versus Old Tendencies”, *World Politics*, Vol.31, No.2, 1979, p.176; Joseph Nye,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New York: Pearson Longman, 2007, p.215。

使英国渐次失去全球优势,迫于情势而必然寻求与美国之间的“相容利益”的扩大化,以最大程度地捍卫英国在欧洲的相对优势地位。

### (三)“不列颠治世”衰朽与国际社会变迁

19世纪末,特别是自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经由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海外扩张建立起来的全球优势地位开始松动。以英美双方在拉美的争夺为例,作为美国“狭隘利益”一部分的拉美,原本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失掉拉美,不仅部分反映了英国“不列颠治世”辉煌难再,且所寻找和捍卫的“相容利益”空间一再压缩。对于美国而言,则是“狭隘利益”逐渐扩大为(与英国的)“相容利益”,直至最终替代英国而成为新的国际社会主导者。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来观察,19世纪末的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列强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争夺、瓜分已进入到最后关头,作为帝国主义生命线的殖民地在这时期被瓜分完毕,那么暂定或既定的殖民体系格局势必也将成为列强之间的矛盾焦点所在。以拉美为例,虽说英国在一战之前对该地区的资本输出仍居于主导地位,但相较其他列强如德国在拉美的投资而言,英国的相对优势大打折扣。<sup>①</sup>可见,英国并不能独享对大西洋彼岸的控制权,反而同时遭遇德国和美国的挑战,还与德国在欧陆激烈角逐主导权。甚而,为了巩固和加快服务于大英帝国的全球贸易金融体系,英国对拉美地区(尤其是中美洲)的渗透手段愈发简单粗暴,频频使用炮舰外交、海上封锁等军事威胁手段迫使墨西哥、委内瑞拉等国在海关关税甚至领土问题上作出让步。<sup>②</sup>虽说英国对拉美地区实施此类强硬外交政策时总是伙同法国、西班牙甚至德国来采取“联合制裁”,但显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过度依赖武力来达成殖民目的,极易招致民族主义反抗。

反过来看,美国在“家门口”捍卫“狭隘利益”并进一步发展为以美国为主导的“相容利益”的做法,似乎比英国更为“游刃有余”——“门罗宣言”的发表虽说有公开与欧洲(英国)叫板之嫌,但美洲“新世界”与欧洲“旧世界”之划分、宣告“非殖民”原则以替代旧殖民体系、提倡“美洲体系”新观念对“欧洲中心”的冲击,的确有助于美国在本地区占领某种国际道德制高点。<sup>③</sup>而且,美国善于利用欧洲“旧世界”的内部矛盾,在美西战争时尽力争取英国的支持,并以支持英国的远东事务作为回馈。此举不仅有助于美国集中精力处理“美洲体系”的“内部事务”,奠定美国在本地区的霸权优势地位,

<sup>①</sup> 参见[俄]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0-631页。

<sup>②</sup> 孙洪波:“英帝国在拉美:经济霸权与外交策略”,《拉丁美洲研究》2014年第6期,第6页。

<sup>③</sup> 王鹏:“美国对拉美政策的缘起及其启示”,《拉丁美洲研究》2014年第6期,第9-14页。

而且一度给深陷于欧洲冲突螺旋中的大英帝国释放了某种信号——只要将西半球交给美国,那么欧洲一旦发生战事,美国最起码也会保持中立。<sup>①</sup>

事实上,对于拉美国家而言,其实也存在类似英国“两害相权取其轻”式困境,只不过,相比英国等欧洲老牌殖民列强而言,美国的美洲政策显得更为“开明”和“温和”。19世纪末,美国第27届总统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上台伊始,就意识到其前任总统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大棒政策易招致拉美地区民族主义反抗或激发反美情绪,于是推出“金元外交”,即希望以金元代替子弹,用理想主义的人道情感、健全的政策策略指导和正当的商业目的为美国的对外战略铺平道路。“金元外交”既满足了美国对拉美进行经济渗透的需求,又迎合了该地区内可能存续的统治者独裁需要,从而使美国软实力在拉美获得生长的土壤,更何况拉美和美国具有共同的被殖民经历:属于美洲和欧洲新旧世界交互的混合区域,具有开放性和多样性,这种共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美国与拉美之间产生共鸣。<sup>②</sup>何况,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和制度缺乏包容性,难以将殖民地的臣民接纳为公民,导致离心力加大,加上以英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缺乏制度建设,难免引发市场萎缩,反过来又侵蚀了英国世界霸权的经济基础。<sup>③</sup>换言之,国际社会的变迁,尤其伴随美洲大陆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作为“旧世界”原殖民地的美洲大陆国家不可能一直容忍“二等公民”的地位,这在客观上对美国有利;加上美国“因势利导”,推行“金元外交”,使用“胡萝卜”来替代“大棒”,并加大对拉美的投资贸易,使美拉关系向国际经济交往的三重阶梯——原材料-产品、投资和技术转移——迈进,在客观上拉动了美洲大陆的经济增长,有助于提升美洲大陆的整体国际经济实力。此外,相对英国的旧式殖民政策,美洲大陆的殖民地更欢迎像美国的美洲政策那样更为“温和”的新政策,同时美国还寻求与英国之间的“利益相容”,使权力和平转移得以在地区层面渐次实现。

#### (四)小结

以上三方面的主体分析意在强调大英帝国及其应对挑战时的艰难抉择,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寻找和英国之间的“利益相容”,也是政治系统进程中十分重要的反馈效应。因此,不挑战对方的核心利益、英美权力转移的长期性以及美国作为新兴大国崛起的国际政治意义等,同样是我们从这段历史中可能获得的启

<sup>①</sup> 袁明主编:《国际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美]罗伯特·杰维斯:《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李少军、杨少华、官志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4页。

<sup>②</sup> 参见[美]德怀特·L·杜蒙德:《现代美国:1896-1946年》,宋岳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48页;魏红霞:“美国在拉美软实力的构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第S2期,第71-74页。

<sup>③</sup> 黄琪轩、蒋倩颖:“包容性制度、海外市场与企业家创新——19世纪末英国技术衰落的政治经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51-59页。

迪。例如,学界一般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美在美洲问题上的博弈视为英美权力转移的重要标志,即便如此,从美国建国算来也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实际上,这种所谓全球权力的“和平”交接(即崛起国不以霸权战争直接对抗的方式获得与霸权国平起平坐的地位甚或取而代之),其最终完成的标志是1941年8月的《大西洋宪章》。从其性质上看,这项政治宣言由英美双方共同发表,但它既不是两大国之间的条约或协议,也不是对和平目的最终的正式表达,而是一份对“各自国家政策中的若干共同原则(对更好的未来世界的期望以此为基础)”的肯定。《大西洋宪章》几乎没有法律效力,但这并不影响其价值和意义,因为它出自当时最重要的两位大国领导人之手,并且基于美国全面的道义支持以及有关国际道德、国际组织的蓝图畅想。<sup>①</sup>曾经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国”的政府首脑(温斯顿·丘吉尔)为了促成英美两国政治同盟的形成和反法西斯大同盟的建立,不得不屈从于美国领导人(富兰克林·罗斯福)有关战后国际秩序的构想。可以说,《大西洋宪章》更多地体现了美国的思想意志和国际秩序观,标志着英美权力和平转移的最终完成。<sup>②</sup>

#### 四 英德关系的历史教训

19世纪末期,随着经济、军事实力的快速增长,德国几乎以绝对的挑战者姿态强势崛起于欧洲大陆。对于这一历史时期的德国,史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几乎都偏好从海军军备竞赛/冲突螺旋来进行解释。<sup>③</sup>而笔者从“利益相容”的视角进行回顾后发现,英德两国利益原本相容,但这种“相容利益”裂痕自19世纪末开始显现,并快步走向疏离,最终演化为带有霸权战争色彩的地区冲突乃至世界大战。

##### (一) 英德关系中的“利益相容”

从19世纪中后期的历史来看,英德双方存在“利益相容”——共同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就英国而言,欧陆的和平与稳定有助于捍卫其在国际社会中的优势地位,从而将重心逐步转向远东地区及对海外殖民利益的经营;从德国来看,自普鲁士时代实施铁血政策以及通过王朝战争实现统一以来,作为现实主义者和杰出外交家的俾斯麦

<sup>①</sup> 参见“大西洋宪章”,[http://www.un.org/zh/aboutun/history/atlantic\\_charter.shtml](http://www.un.org/zh/aboutun/history/atlantic_charter.shtml),2017年3月23日访问。

<sup>②</sup> 参见杨永锋:“《大西洋宪章》再现英美论战——评述历史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启示”,《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6期,第60-69页。

<sup>③</sup> 参见 Paul Kennedy,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2; Paul Kennedy, *Strategy and Diplomacy, 1870-1945: Eight Studie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3; 最新研究参见 Christopher Clark, *The Sleepwalker: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London: Penguin, 2013; Margaret 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 London: Penguin, 2013; Adam Tooze, *Deluge: The Great War and the Remaking of Global Order 1916-1931*, London: Penguin, 2014。

迫切希望德国“休养生息”,从而捍卫来之不易的新兴大国地位,何况德国崛起本身也有助于平衡法国在欧陆的权力,这其实也符合英国的大陆均势战略意图。此外,英国与法国、俄国的对立,使英德之间似乎更容易找到“共同语言”,德国也迫切需要来自英国的支持,以缓解在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压力。<sup>①</sup>英国和德国也具有较强的经济纽带关系,并一度保持着良好的双边互动。1892年,面对法俄接近带来的威胁,英国也迫切希望实现某种英德同盟的可能性。<sup>②</sup>

## (二) 英德关系裂痕初现

英德关系从“利益相容”走向相互疏离,始于“世界政策”(Weltpolitik)的实施与海军竞赛。1890年,德皇威廉二世勒令铁血宰相俾斯麦辞职,德国外交政策因之失去往昔拥有的灵活性。1891年,威廉二世迫不及待地推出所谓“世界政策”,引发德国外交政策的震荡。“世界政策”的实质在于推动德国向世界强权转型,通过获取海外殖民地、发展大规模的海军等进攻型的外交政策来实现目标。1897年,时任德国外交部长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宣称:“我们不希望将任何人置于阴暗处,但我们要求阳光下的地盘”。<sup>③</sup>1898年4月,德国通过了第一部海军法案,明确加强海军建设,将德国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地缘政治能力,推动“世界政策”的实践。1900年,德国又紧锣密鼓地通过了第二部海军法案,计划建设38艘世界级战舰,希冀德国的海军建设计划可以打破自拿破仑战争时代以来的欧洲均势。值得一提的是,有“德国海上军事力量缔造者”之称的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并不打算超越作为海上全球霸主的英国,仅是期望德国海军作为某种“风险投入”手段,使英国和其他列强能够尊重德国在欧洲的主导权。如果说大英帝国的战舰因帝国实力扩散而无所不在,那么德国战规则主要谋求在北海区域的布防,以获得在欧洲的战略优势和影响力。提尔皮茨认为,“世界政策”的杠杆在北海,其影响将遍及全球。<sup>④</sup>

## (三) 负反馈或错误认知

面对德国海军建设之雄心,英国起初的反应较为谨慎,或者说至少不确定这种地缘政治信号代表着机遇还是威胁。直到1902年,由于布尔战争期间德国支持布尔人,让英国大为恼火,从而对德国的不信任感加剧,国内公众的反德情绪也在滋生蔓延,提尔皮茨的海军计划更是让英国感到威胁近在咫尺。因此,与提尔皮茨的预期刚好相

<sup>①</sup> 参见顾全:“偏见、互疑与海权:论一战前英德关系的倒退及影响”,《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5年第5期,第44-46页。

<sup>②</sup> Paul Kennedy,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 p.233.

<sup>③</sup> Christian Anderson, “The Emperor’s New Expressionism: Wilhelm II and the Modern Crisis”, *Liminalities: A Journal of Performance Studies*, Vol.9, No.1, 2013, p.8.

<sup>④</sup> Paul Kennedy, *Strategy and Diplomacy, 1870-1945: Eight Studies*, p.133.

反,当德国在英伦近海推进海军计划时,英国开始将本土外围区域的战舰集中调回近海水域。如上文所述,“两害相权取其轻”,英国已做出抉择并改善与美国的外交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英国集中精力重新调配海军军力,确保皇家海军始终占据比德国更为强大的优势。由是观之,提尔皮茨所精心设计的海军计划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落空。<sup>①</sup>

反过来看,德国国内日益增长的仇英心理也推动了冲突螺旋的加速。众所周知,1907年英国加入法俄联盟,签署三国协约,旨在限制德国扩张,这一行径无异于助燃德国国内的恐惧情绪;作为回应,德国继续扩充军备,加剧同协约国尤其是英国之间的恶性竞争。尽管英德双方都曾试图探寻协商谈判以终止海军竞赛的可能性,然而最终却由于彼此的强硬派阻挠无果而终。换言之,作为维持现状国的大英帝国自然不希望爆发大规模战争,因为这意味着既定秩序被打破的风险增加抑或战后修复(以英国为主导的)均势的成本/代价高昂;德国方面从“海军力量讹诈”来考虑,也并不希望战争爆发,然而其海军计划本身却成为催生与自己相对抗的联盟的导火索。诚然,德国海军建设初衷似乎在于主动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但因为安全保障的内在动因驱使形成的战略决策,却将自己推向了极度危险的悬崖边缘——1898年以前德国曾尽力避免的、无意识的霸权战争终究成为可能。

#### (四)小结

与上文英美关系案例讨论相似,本节有必要将相关历史还原或代入国际社会叙事情境,而非孤立看待英德/英美双边关系。由此方能以历史为镜鉴,得出更为全面的战略启迪。

英美权力转移反映了双方高度默契或曰巧妙的自我约束,英德之间的大国冲突历史悲剧则证实了军备竞赛失控的严重后果。因此,不论对于新兴大国还是守成大国而言,保持必要的战略克制和自我约束,并非绝对的示弱,而是双方都应明确的战略考量。新兴大国出于崛起中和发展中的权力/权利需求,有必要自我约束,避免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直接对抗而陷入英德关系式的悲剧历史循环;守成大国同样出于战略收缩和大国兴衰铁律/宿命而不得不保持克制(尽管其外交辞令或大众政治语言未必释放相应的“善意”信号),因而“修昔底德陷阱”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此外,就英美权力转移和英德关系而言,我们似乎更多地关注大国之间的互动层面或曰国际关系本身,但霸权兴衰还需要思考其中的内部动因,对于当前的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而言亦同理。守成大国,与其“逆势”阻遏新兴大国的崛起或寻求“各个击

<sup>①</sup> Paul Kennedy,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 pp.251-252.

破”以消解新兴大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力,不如多关注自身存在的内部弊病,并寻求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相容”以维系国际社会福祉的延续(事实上,越南战争结束后的美国一直在战略收缩和扩张问题上纠结徘徊);新兴大国,应知己知彼,了解霸权衰落的历史定律,不刻意挑战和过度刺激守成大国的“敏感神经”,同时专注于国际政治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尤其注重国家-社会的良性互动和国际国内政治生态的和谐可持续。例如,与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不同,中国无意追求任何形式的全球主导地位,只是维护自身发展权利,并不打算同美国进行全面竞争,但这不等于放松对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发展水平提升之要求,毕竟政府的合法性自现代国家发展以来即取决于能否满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民众对社会福利的分配。这对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同样适用,因而也是彼此寻找“利益相容”的一个现实契合点。<sup>①</sup> 对于中国外交而言,坚持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韬光养晦”正当其时,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并在当前的国际社会秩序中寻找与包括守成大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群体之间的“利益相容”,尽可能推动国际秩序的平稳变革,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 五 迈向新型国际关系:从“利益相容”到合作共赢<sup>②</sup>

基于以上核心概念、理论假定和案例比较,我们似乎还难以实现从英美德之间的复杂互动(1898-1945年)乃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际关系镜鉴向“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的简单跨越。因而,仍有必要对可能存在的问题(或进一步的研究方向)进行集中回应和补充说明。

第一,“利益相容”与合作共赢。将“利益相容”作为核心概念用来分析国际社会中的国家间互动或许值得尝试。相关讨论之于国际社会的扩展应用,与包括奥尔森在内的学者动辄将“相容利益”与诸如联盟、集体行动、国际合作等紧密挂钩的理论雄心相比,本文所谓寻求“利益相容”可以说是一种较为“谨慎”的理论假定或起点。因为不论从理论还是事实来看,联盟、集体行动和国际合作中的行为体(如大国)之间至少已经/部分实现“利益相容”,即建构起了相容群体(如以国际条约、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为纽带);但反过来,寻求“利益相容”或者实现“利益相容”却并不能保证联盟的形成、集体行动和国际合作的最终落实。这一点,不论帝国主义时代还是二战后都同样适用。换言之,倘若“利益相容”能轻松抵达“合作共赢”这一理想彼岸,那么世界政治

<sup>①</sup> 阮建平:“成本强加:美国强化对华竞争的方式探析”,《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3期,第25-26页。

<sup>②</sup> 本部分讨论得益于匿名评审专家的指导与启发,作者在此表示感谢。



中的多数难题或许将不复存在。

横亘在“利益相容”与合作共赢之间的天堑恐怕不止一道。对于新兴大国而言,崛起本身具有长期性,英美各自“身在此山中”,或许难以对崛起的长期性具备全面认知,但我们可从历史中学习,认识到崛起进程本身不可能一蹴而就。自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至1945年二战结束,英美权力和平转移的最终完成,经历了半个世纪之久。那么,对于新兴大国和国际社会主导国而言,都应当意识到双方互动关系的全球性和长期性,从而尽可能加强对话,寻求“利益相容”,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议题领域拓宽合作空间,通过“议题联系”(issue linkage)来延展“相容利益”空间,尽可能削弱“狭隘利益”的负效应。长期性意味着不论新兴大国还是全球霸主,倘若拘泥于眼前“狭隘利益”,不惜与国际社会“相容利益”相疏离,则必定会付出巨大而沉重的历史代价。何况,当前全球霸主美国倘若与新兴大国发生直接冲突对抗,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灾难也将是全球性的,必将是“一损俱损”的大国政治悲剧。因此,对于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而言,都需要警惕冲突“自我实现的预言”,尽可能维系双方的良性互动。

第二,政治理念、“利益相容”与国际社会。英美与英德关系(1898-1945年)的时空案例比较中,似乎仍留有一个潜在的疑问:何以英国在霸权衰减时期为自由主义思潮所主导,而美国崛起时也正好是自由主义当道,在同一思潮之下,英美实现了权力的和平过渡?事实上,从形而上的角度来看,所谓同一思潮下的“英美趋近”如上文“两害相权取其轻”一般,仍然是一个相对的标签假定。相比笼统的“事后诸葛亮式”的英美文化亲缘论,或许从微观心理学的观念出发更有新意甚至更具说服力,因为自由主义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欧洲历史文化遗产,这种遗产的嬗变甚或缺失,至少同时解释了同一时空中德国自由主义的“变异”/先天不足,从而偏向国际社会“狭隘利益”诉求并与英国相疏离。

众所周知,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项社会运动、一套观念或制度,的确诞生于西欧,并逐渐蔓延至整个世界——其意蕴不局限于法国大革命以降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博爱”,而且还包括现代国家及其法律秩序。德国自由主义理念形成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对未来抱有乐观的期待并因此容忍现状的不足;至于革命,则被视为非必要甚至危险的行动,因为这种血腥记忆(bloody memory)早已被1789-1848年的欧洲历史反复强化。<sup>①</sup>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德国自由主义在国家与地区层面为人们呈现了一幅新的复杂图景,并反映了德国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自由主义在德国

<sup>①</sup> Dieter Langewiesche, “The Nature of German Liberalism”, in Gordon Martell ed., *Modern Germany Reconsidered, 1870-194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98.

仍具有一定的发展优势,并引导了德国政治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广泛的社会动员作用,但随后开启的德国统一历史进程导致自由主义逐渐面临分化以及对立思潮的挑战(这种挑战在1867年俾斯麦推行民主改革和民族主义革命时达到顶峰)。<sup>①</sup> 尽管自由主义在地方政府层次仍保持着重要影响,却终究于1914年被国内政治边缘化。德国政治思想史上的自由主义兴衰,极大地影响了德国国运,及至1933年,德国自由主义与民主制度更是遭遇灾难性终结。<sup>②</sup> 与此同时,自由主义思潮在英美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嬗变。就英国而言,作为对拿破仑战争的某种回应和反思,英国自由主义与其帝国情怀也通过多种形式相互强化,国内政治走向自由化。更多的公民权及政治参与诉求开始得到重视,伴随英国工业巨头的进一步强大,其政治需求也相应增加,进而其雇用的劳动者也受此影响,要求更广泛的公民权利和宗教自由,自由民主因之在大英帝国内部稳步演化;在美国,自由主义则发展成为另一个版本。早在美国独立之初,安全是自由主义的先决条件,随后在至少30年的时间内,不列颠及大革命后法国意识形态对美国国内政治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同样出于安全的考虑,美国的自由主义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孤立主义心态,如美国国父华盛顿就认为欧洲专制国家争权夺利,因此不希望美国卷入欧洲冲突。<sup>③</sup> 总体比较而言,与自由主义渐行渐远的国家往往偏向最具攻击性的(如“进攻型现实主义”标签所揭示的)外交政策,而且这类国家具有三大特点:(1)中产阶级数量较为可观;(2)中产阶级的相当一部分成员封建化;(3)政府由秉持前现代价值观念的贵族掌控,这些特点在德国和奥地利表现得淋漓尽致,法国和俄国紧随其后,英国最不明显。<sup>④</sup> 因此,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嬗变的角度考察,为我们理解大英帝国与美式自由主义之间的“利益相容”提供了一种形而上的全新视角,即美国“孤立主义”地区霸权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英国的全球战略需要,使英国通过“远交近攻”专注于制衡近在咫尺的德国威胁。此外,美国在美洲地区的新殖民政

<sup>①</sup> 在德国统一的雄图霸业面前,自由主义越来越显得“过时”,并在崛起的德意志帝国中被边缘化,俾斯麦的强势上台也被历史学界视作德国自由主义“投降”(capitulation)命运的开端,参见 Gordon R. Mork, “Bismarck and the ‘Capitulation’ of German Liberalism”,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43, No.1, 1971, pp.59-75。

<sup>②</sup> 参见 James Sheehan, *German Liber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James Hunt, “The Bourgeois Middle in German Politics, 1871-1933: Recent Literature”,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11, No.1, 1978, pp.83-106; David Blackbourn, “The Mittelstand in German Society and Politics, 1871-1914”, *Social History*, Vol.2, No.4, 1977, pp.409-434; 徐健:“19世纪初德国的自由主义国家理论及其实践”,《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50页。

<sup>③</sup> Daniel McCarthy, “Why Liberalism Means Empire”,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July 16, 2014, <http://www.theamericanconservative.com/articles/why-liberalism-means-empire/>; 赵可金、倪世雄:“自由主义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12页。

<sup>④</sup> Richard Ned Lebow, *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314.

策,对本地区的经营也体现出了“宽容”(tolerance)<sup>①</sup>——提供区域国际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令其地区霸权得以稳步发展,并获得了持久的战略机遇和广阔的战略空间。

第三,“利益共容”与“大国无战争时代”。不论探寻新型国际关系的建构路径,还是研讨广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命题——历史,尤其是国际关系史的重要启迪或案例的价值毋庸置疑。但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可能存在的难题或挑战无非在于这种“历史学习”/以史为鉴将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当代感或曰现实启迪。诚然,上文讨论所涉及的案例比较似乎较为遥远(多集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二战之后的世界似乎早已今非昔比,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大国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也更为复杂多变,且因为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经济相互依赖、核武器的出现及核威慑,国际政治一度进入所谓“大国无战争时代”——1945年以来大国间战争变得稀少而不易发生。<sup>②</sup>根据经验总结和理论判断,不少学者也较为乐观地认为“大国间战争近乎消亡”。<sup>③</sup>但是,不论我们是否承认“大国无战争时代”这一1945年以降国际关系最大的变化,即使单从“利益交换”这类功利的工具理性出发,当代国家间政治尤其是大国间互动选取武力胁迫的成本显然远高于“利益交换”,而在世界政治中逃离“自然状态”、树立某种权威和等级制的关键则在于(作为全球/区域国际社会公共产品的)安全秩序的供给,这一点不论对霸权国还是崛起国同样适用:“大国无战争时代”中的“利益交换”比武力胁迫更

<sup>①</sup> 此处“宽容”指的是帝国满足于地区霸权,并实施较为温和的殖民/统治政策,构建区域国际社会,提供相应的国际公共产品,从而使地区霸权得以延续而不过分扩张,避免帝国透支。这种较为另类的“宽容”政策及其对帝国的意义解读,参见 Amy Chua, *Day of Empire: How Hyperpowers Rise to Global Dominance—and Why They Fall*,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2007。

<sup>②</sup> “大国无战争时代”的提法主要来自杨原博士对联盟理论与大国权力竞争机制的相关研究,参见杨原:“武力胁迫还是利益交换?——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第96-116页;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第13-16页;杨原、曹玮:“大国无战争、功能分异与两极体系下的大国共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8期,第33-36页;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的大国权力竞争:行为原理与互动机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不过在笔者看来,尽管“大国无战争时代”似乎仍存在一定争议,但其作为理论假定/逻辑起点/预设前提的意义似乎远甚于其是否成为国际政治事实的争议,因此从理论建构意义上来看,“大国无战争时代”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象征意义颇为相似。

<sup>③</sup> Carl Kaysen, “Is War Obsolete?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4, No.4, 1990, pp.42-64; Rober Jervis, “Theories of War in an Era of Leading-Power Pea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6, No.1, 2002, pp.1-14; John Mueller, “War Has Almost Ceased to Exist: An Assessment”,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24, No.2, 2009, pp.297-321; Shiping Tang,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Mearsheimer to Jervi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6, No.1, 2010, pp.31-55; Shi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65.

能有效地维系或提升大国的影响力,且有望塑造他国对自己的认同。<sup>①</sup>反过来说,回到上文特别是有关英美权力转移的历史分析,在类似霍布斯丛林、战争频仍且尚无核威慑的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尚能实现“利益交换”甚或寻找“利益相容”,那么我们更没有理由怀疑现时代大国间共存相容并为国际社会福祉而“共生共治”的可能情境。只不过,如上文作为反例的英德关系历史教训所揭示的——“共生”与“对立/冲突”之间可能仅一线之隔,首创“中美国”(Chimerica)提法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就提出警告:百余年前的英德关系可谓“共生”与“对立/冲突”并存,今日的中美关系亦复如是。<sup>②</sup>经济学者扎卡里·卡拉贝尔(Zachary Karabell)也认为,美国需要吸取大英帝国的历史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因而需要重塑身份定位,不仅要改变看待世界的方式,更要改变美国和世界互动的模式,从而迎接21世纪的经济挑战。<sup>③</sup>

可见,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寻找“利益相容”不仅可能而且必要,甚至对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竞合互动乃至国际关系的演化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具体而言,如不挑战大国的核心利益——不论是作为国际社会秩序的守成大国,还是后起的新兴大国,都不应当挑战对方的核心利益。诚然,对于当代国际关系而言,不论国际社会背景还是国家实力格局,相比19世纪或20世纪而言可谓天翻地覆,但对于崛起大国或当前的新兴大国(如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和全球霸主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言,不挑战对方核心利益这一信条仍然适用。这不仅要求新兴大国不得不在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当中谋求“渐进”变革,或尽可能享用现存国际社会福祉(如联合国成员权利、WTO和世界银行份额等);同时,也要求作为唯一世界霸主的美国,即使出于维系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社会秩序之“狭隘利益”,也不得不寻求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兼容”,寻找双方的“利益相容”并尽可能拓宽其中的“相容利益”空间,从而至少延续“霸权后合作”,实现美式国际社会福祉。那么,这对于决策者而言,实际上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如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的“推特外交”不乏武断,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

<sup>①</sup> 参见 Alexander Wendt and Daniel Friedheim, “Hierarchy under Anarchy: Informal Empire and the East German St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9, No.4, 1995, pp.689-721; David Lake, “Escape from the State of Nature: Authority and Hierarchy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2, No.1, 2007, pp.47-79; 陈寒溪、杨原:“通信:当代大国行为发生了本质变化?”,《外交评论》2012年第1期,第158-159页。

<sup>②</sup> See Niall Ferguson, *Empire: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 Order and the Lessons for Global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Niall Ferguson, *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London: Allen Lane, 2008; Niall Ferguson, “U.S.-China Cooperation Is Critical to Global Economic Health”,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7, 2008,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11/16/AR2008111601736.html>, last accessed on 23 March 2017.

<sup>③</sup> See Zachary Karabell, *Superfusion: How China and America Became One Economy and Why the World's Prosperity Depends on I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9.

系协议》(TPP)和全球气候政治《巴黎协定》更令世界哗然,但综合考虑其实用主义外交和美国政治的连续性,显然“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在短期内胜过“让地球再次伟大”(Make Planet Great Again)之全球道义考量。<sup>①</sup>不过,对于新兴大国而言,仍应坚守本国的核心利益,同时寻求在国际社会当中适当拓展“相容利益”,从而避免游离于体系秩序之外而徒增崛起压力或阻力,但这不等于想当然以为中国等新兴大国需要因此承担过多的大国责任或国际义务,因而尤其需要警惕新的“中国责任论”陷阱,避免因成本强加而引发战略透支。

言而总之,迈向新型国际关系,其征途无疑布满荆棘,从“利益相容”到合作共赢之间也有不小的距离。何况,对于当前新兴大国与霸权国间关系而言,显然比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美德政治理念嬗变与“利益相容”的情形更为复杂。比如中美之间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大国之争,毕竟还有制度及背后的价值之别(这种差别不仅限于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诚如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代表人物大卫·休谟(David Hume)不乏睿智而犀利的洞见所指出的:“我们无从知晓因果之间的关系,而至多了解某些事物之间可能会发生‘持续连接’(constant conjunction)而已……但我们仍只能观察这些事物本身,而对事物联结背后或许存在的理性却难以捉摸……”,因而似乎难以确信一事物必然造成他事物,亦难以对二者间的未来“持续连接”始终怀抱乐观——某种程度上,人们所相信的因果关系或许并非自然本质,而不过是思维惯性、心理习惯和人性使然。<sup>②</sup>可见,“休谟之问”不仅拷问哲学思辨,而且恐怕也是我们以历史为镜鉴时难以完全搁置或回避的经验困惑。<sup>③</sup>进而,即使1945年以降“大国无战争时代”无限接近于经验事实,或许亦仅仅部分实现了传统安全意义上的大国间和平(Great Power Peace),而这离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愿景,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寻找“利益相容”,可能只是起点,但对当前乃至可见将来的国家间政治互动而言,仍具有探索价值。

(作者简介:赵斌,西安交通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英国爱丁堡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后;责任编辑:宋晓敏)

<sup>①</sup> Karen Tumulty, “How Donald Trump Came up with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8,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how-donald-trump-came-up-with-make-america-great-again/2017/01/17/fb6acf5e-dbf7-11e6-ad42-f3375f271c9c\\_story.html](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how-donald-trump-came-up-with-make-america-great-again/2017/01/17/fb6acf5e-dbf7-11e6-ad42-f3375f271c9c_story.html); Jon Henley, “‘Make Our Planet Great Again’: Macron’s Response to Trump is Praised”, *The Guardian*, June 3,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jun/03/make-our-planet-great-again-macron-praised-for-response-to-trump>, last accessed on 12 June 2017.

<sup>②</sup> 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93; Richard Henry Popkin and Avrum Stroll, *Philosophy*, Oxford: Made Simple Books, 1993, pp.268-272.

<sup>③</sup> 这一观点的思辨,得到了《欧洲研究》审稿人的指导和启发,特此感谢。